

政治现代化与国家发展

——基于沙特受困“资源诅咒”的分析

张帅 储斌

内容提要：“阿拉伯之春”后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因而其自身发展也愈发具有“外部性”。但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沙特又受困于“资源诅咒”，国家经济严重依赖石油部门。无论是从中东地区稳定角度出发，还是从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角度出发，沙特能否克服“资源诅咒”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沙特政府克服“资源诅咒”的最新尝试就是2016年推出的，意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多元化的《沙特2030愿景》。尽管沙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但“低”政治发展水平，对沙特的国家治理能力造成巨大损害，使《沙特2030愿景》落实过程中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关键词：沙特；资源诅咒；政治现代化；国家发展

作者简介：张帅，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经济（北京，100044）；储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台湾问题（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36(2019)03-0106-15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一些阿拉伯国家纷纷进入多事之秋，沙特却因为丰富的石油储备^①、传统^②、美国支持^③等多种因素而成为中东的“稳定之锚”，在

①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In The Middle East,” March 23, 2017, <https://publicpolicy.wharton.upenn.edu/live/news/1778-the-political-economy-of-oil-in-the-middle-east/for-students/blog/news.php>,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4日。

② Jason Burke, “Saudi Arabia is Simply a Very Different Society From Egypt, Tunisia or Syria,” June 30,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jun/30/saudi-arabia-not-egypt-reform>, 访问时间：2019年3月14日。

③ “U.S.—Saudi Arabia Relations,” December 7, 2018,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us-saudi-arabia-relations>,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4日。

叙利亚内战、伊核问题等中东重大事务上的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但沙特的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石油，明显陷入“资源诅咒 (Resource Curse)”之中。2016年，沙特政府推出《沙特 2030 愿景》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经济的多元化。《沙特 2030 愿景》的最终结果，不仅关乎沙特发展，还与中东局势走向密切相关，并且能够对广大具有类似情况的发展中国家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存在自然资源究竟是中低收入国家发展的诅咒，还是祝福的争论。^①1993 年，奥蒂 (Richard M. Auty) 在研究矿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首次在正式经济学文献中使用了“资源诅咒”这一概念，认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②自此，“资源诅咒”这一概念主要用来表示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不会成为国家发展的优势，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资源”本身并不必然转换为“资源诅咒”，政治制度在“资源诅咒”能否生成，以及避免其发生的作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③

为了启动经济增长，强大的政治制度是必需的；恰恰是它的缺席，将失败或脆弱的国家扔进了冲突、暴力和贫困的恶性循环。^④因此，国家发展的失败往往是制度失败的结果。^⑤“资源诅咒”只是国家政治制度失败的诸多后果之一，而非原因。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认为，只有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三个领域获得平衡，才能建立强大的政治制度。本文正是利用这三个标准，论证正是由于沙特尚未完成政治现代化，才使自身深陷“资源诅咒”的泥潭。

① Michael L. Ro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source Curse,”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2, 1999, pp.297–322.

② P. Stevens, “Resource Impact—curse or Blessing? A Literature Survey,” *Journal of Energy Literature*, Vol. 9, No.12003, pp.1–42.

③ 参见：Ross, Michael,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Resource C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8, No.1, pp.239–259；范振婷等：《“资源诅咒”问题研究综述》，载《资源与产业》2015 年第 6 期，第 1—6 页；Sarah M. Brooks, Marcus J. Kurtz, “Oil and Democracy: Endogen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2, 2016, pp.279–311.

④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4 页。

⑤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Grown Publish Group, 2012, pp.1–5.

一、“资源诅咒”与沙特发展困局

(一) 石油：助力沙特发展

沙特石油储量高达 2600 亿桶，每天产量维持在 1000 万桶，每天出口量在 700—800 万桶。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 75% 来自石油行业，石油对沙特国家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如何更好地利用石油收益，成为历届沙特政府的首要议题。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在内外形势影响下^①，沙特实行了一系列以收回石油权益为主的举措，奠定了当今沙特的石油收益模式。

对内，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对阿美石油公司实行石油国有化。从 1974 年开始，沙特政府不断提高对阿美石油公司的控股比例。1988 年沙特政府全面接管阿美石油公司，更名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该公司成为垄断沙特国内从勘探、提炼、运输和销售生产的国有石油企业。^② 阿美石油公司目前掌握了沙特 2600 亿桶石油储备，市值估计在 2 万亿美元至 10 万亿美元之间。^③ 对阿美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大大提升了沙特利用从国内石油资源中获益的能力。对外，1960 年 9 月 9 日至 14 日，沙特联合委内瑞拉、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在巴格达发表《会员国石油政策声明》，协调各国产油政策，标志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式成立 (简称 OPEC)。由于对世界石油市场掌控下降、OPEC 内部协调困难加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沙特政府对 OPEC 表达了不满情绪，受沙特政府资助的该国顶级智库阿卜杜拉国王石油研究中心 (Kapsarc) 正在研究拆分 OPEC 后对油市的影响。^④ 但在经济层面，OPEC 的存在对其成员产生了积极作用。^⑤

① Stephen J. Kobrin, "Diffusion as an Explanation of Oil Nationalization Or the Domino Effect Rides Aga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9, No.1, 1985, pp.3-32.

② "Kindom of Saudi Arabia Ministry of Petroleum of Mineral Resources," *Saudi Aramco*, http://www.mopm.gov.sa/mopm/detail.do?content=co_ac, 访问日期: 2019 年 3 月 14 日。

③ Kevin Baxter and Summer Said, "Could Saudi Aramco Be Worth 20 Times Exxon?" *January 8,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saudi-aramco-confirms-ipo-study-1452254819>, 访问日期: 2019 年 3 月 15 日。

④ Summer Said and Benoit Faucon, "Saudi Arabia, OPEC's Anchor, Ponders a Future Without the Cartel," *November 8, 20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saudi-arabia-opecs-anchor-ponders-a-future-without-the-cartel-1541703893>, 访问日期: 2019 年 3 月 15 日。

⑤ Jamola Khusanjanova, "OPEC's Benefit for the Member Countries," *Research in World Economy*, Vol.2, No.1, 2011, p.19.

石油财富的持续涌入助力沙特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成就，2018 年沙特人均 GDP 高达 22650 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GDP 排名世界第 18 位。^①

（二）石油：沙特经济的“资源诅咒”

漂亮的经济数据背后，是沙特国家经济对石油的高度依赖。

首先，沙特的经济走势与国家财政高度依赖石油部门。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降，2009 年沙特的 GDP 的增速也从 2008 年的 6.5% 将至 -2.1%。2014 年后，国际原油价格长期低位运行的影响，沙特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下降，2017 年再次出现 -0.9% 的负增长。^②与此同时，沙特政府始终承受巨大的财政压力。2014 年以来，WTI 原油期货价格每桶在 45—58 美元之间。尽管沙特的石油生产成本每桶仅为 9.9 美元^③，远低于同期 WTI 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但沙特财政预算的平衡点在每桶 80 美元。^④因而，国际原油价格低迷对沙特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为应对巨大财政赤字，2016 年 9 月，沙特阿拉伯首次进入国际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并于同月决定削减公共部门薪资，这是沙特历史上首次降低公共部门的薪资待遇。但沙特财政状况并未因此改观，在 2019 年的政府预算中，预计赤字为 350 亿美元，沙特已经连续六年出现财政赤字，沙特政府预计 2023 年才能达到收支平衡。^⑤

其次，沙特无法将石油财富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本。沙特存在严重的人力资本与商业资本浪费。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尽管依靠石油财富，沙特

①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EO Update(Saudi Arabia),” July 2018,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8/01/weodata/weorept.aspx?sy=2018&ey=2020&scsm=1&ssd=1&sort=country&ds=.&br=1&pr1.x=43&pr1.y=11&c=456&s=NGDPD%2CNGDPDPC%2CPPPGDP%2CPPPPC&grp=0&a=#download>, 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② 数字来源：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SA&view=chart>, 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③ Alanna Petroff, “7 crazy numbers about the world’s biggest Oil Company,” <http://money.cnn.com/2016/05/10/news/companies/saudi-arabia-aramco-oil-ipo/?iid=EL>, 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④ “Oil Price Rise Amid Lower US Stockpiles,” *Rising Global Tensions*, April 18, 2018, <https://sputniknews.com/business/201804181063681893-oil-prices-stockpiles/>, 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⑤ Jareer Elass, “Saudi Arabia’s State Budget for 2019 to Largest Ever,” January 6, 2019, <https://theArabweekly.com/saudi-arabias-state-budget-2019-be-largest-ever/>; 《沙特公布 2019 年财政预算》，2018 年 12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812/20181202818218.shtml>, 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各个阶段的教育都是免费的,但沙特的学生在学校更多进行机械式学习,学习内容多为宗教、历史和文学,导致沙特学生缺乏市场所需要的创造力和相应技能。^①这种偏重文科的教育制度,不仅使得本国公民失业率长期维持在两位数以上,高于全国失业率,同时恶化了大学生的就业形势。^②与此同时,虽然沙特实现了石油产业国有化,但国内产业结构单一,国家出口收入的90%来自石油行业,除了石油和石化制品外,沙特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向国际社会出口的产品。^③国内市场有限,导致沙特国内经济无法消化大量的石油财富。1974年,沙特政府就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采用美元作为石油结算的唯一货币,只能把销售石油所得的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结果就是,沙特的石油财富通过压低美国资本价格的形式,为美国经济服务。

再次,沙特的经济形态具有明显的依附性。据西方学者研究,沙特和工业国家进出口比例关系为:工业国家的出口系数增长1%,沙特进口系数增加0.5%,沙特石油经济依附于世界经济。^④与此同时,沙特的国内经济部门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这是典型的依附形态:面向国际的石油部门,从开采、冶炼、到化工各个环节都具有世界竞争力,但国内其他部门几乎完全依赖石化部门,以及来自石油利润的补贴。

(三)《沙特2030愿景》:沙特摆脱“资源诅咒”的最新尝试

面对持续的低油价压力,2016年4月25日,沙特内阁批准了沙特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沙特2030愿景》,并交由以副王储为主席的该委员会实

① “Saudi Arabia’s Education Reforms Emphasize Training for Job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 October 2010, <http://www.Chronicle.com/article/Saudi-Arabias-Education/1247711>,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5日。

② 相关报道参见:《沙特大学生失业问题严重》,2018年7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07/20180702766129.shtml>;《沙特本国居民就业形势仍然严峻》,2018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经济参赞处, <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01/20180102696558.shtml>,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4日。

③ 沙特出口的非石油产品主要为聚丙烯、聚乙烯、柠檬酸、氨、甲醇、尿素和烃混合物。参见:《沙特2015年对外贸易额下降》,2016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处, <http://sa.mofcom.gov.cn/article/i/201601/20160101246794.shtml>,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5日。

④ J.W.Wright. *Busin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audi Arabi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48.

施。^①《沙特 2030 愿景》的改革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府三方面的内容。^②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沙特非石油收入的多元化，正如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所说：“现在需要做的是分散投资，这样 20 年后沙特经济将不再依赖于石油。”^③

《沙特 2030 愿景》的核心内容是扩充“公共投资基金”和改革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政府试图通过建立价值 2 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利用庞大的基金进行多个领域投资，以便帮助沙特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部门的多元化。^④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改革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出售沙特阿美公司 5% 资产。沙特预计可通过阿美公司此次上市获得 1000 亿美元；第二，推动沙特阿美公司经营多元化。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现正实施全面的转型计划，以将公司打造成为多个行业的领先企业。

《沙特 2030 愿景》其余有关内容主要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领域。对内，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扶持中小企业、提升沙特在矿产领域的收益、改革补贴体制。对外，更好的融入国际体系，积极发挥地理优势，推动地区合作，做世界物流中心，“建立一个独特的区域物流枢纽”，“扩大与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内部联系与经济一体化”。

尽管表面上《沙特 2030 愿景》是依据沙特经济中的方方面面都给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但总体而言，《沙特 2030 愿景》新意有限。早在 1962 年，沙特国王费萨尔在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国民收入来源多样化的思想，在元后沙特多个“五年计划”中都有如增加国民就业、扶持私有制企业、加强居民职业培训的内容，其中许多内容甚至在表述上与《沙特 2030 愿景》如出一辙。沙特此次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内容并没有突破沙特国王费萨尔 1962 年 12 月提出的“十点纲领”，仅涉及政府职能部门调整而已。

① 《沙特 2030 愿景中的主要改革措施》，2016 年 5 月 3 日，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使馆经商处，<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dz/201605/20160501310316.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② 以下有关《沙特 2030 愿景》中的内容皆来自 *Saudi Vision 2030*，<http://vision2030.gov.sa/en/>，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③ 《沙特要建“巨无霸”主权财富基金 规模 2 万亿美元》，2016 年 4 月 3 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4/03/c_128859533.htm，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④ Ian Black, “Saudi Arabia approves ambitious plan to move economy beyond oil,” April 25,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pr/25/saudi-arabia-approves-ambitious-plan-to-move-economy-beyond-oil>，访问日期：2017 年 11 月 26 日。

二、沙特实现“愿景”困难重重

沙特所处的内外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对《沙特 2030 愿景》中的扶持新兴产业、推进地区合作、改革补贴体制、提升国民就业等诸多改革措施的落实,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 外部: 沙特经济与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

世界石油市场供求结构正在发生缓慢,但影响深远。在供给一侧,2009年后,美国“页岩气革命”持续发力。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解除了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①不仅美国,中国等国家也在加紧开发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非常规油气资源大规模进入国际石油市场,其改变全球油气市场的格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需求一侧,201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石油需求增长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阶段,且中国与欧盟正在大力推动新能源技术的应用。^②这些变化在共同推动世界石油市场向买方市场发展,沙特恐怕要适应低油价的世界。^③尽管由于地缘政治等突发状况,世界油价有可能会出现短期上升。^④

沙特的外部安全环境持续紧张,难以提供良好的改革条件。“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原有地缘政治格局被打破,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阿拉伯国家陷入持续动荡之中,埃及地区影响力也大幅下降,随着美国部分放松对中东的控制,沙特愈发要直接承受来自伊朗的战略压力,两国地缘政治诉求中的对立性上升。沙

① “US spending bill lifts 40-year ban on crude oil exports,” December 18, 2015, <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35136831>, 访问日期: 2019年3月15日。

②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Its Cleanenergy Technology,” March 15,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18/03/15/china-is-rapidly-developing-its-clean-energy-technology>; European Commission, “Promoting The Rational Use of Energy and Small Scale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pplications in Buildings,” July 17, 2014, <https://ec.europa.eu/energy/intelligent/projects/en/projects/enerbuilding>, 访问日期: 2019年3月14日。

③ Javier Blas, “OPEC Said to Break With Shale in Rare Show of Detente,” March 7, 2017,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3-07/opec-said-to-break-bread-with-shale-in-rare-show-of-detente>, 访问日期: 2019年3月15日。

④ Sam Meredith, “US Sanctions On Iran Are Set to Keep Oil Prices Elevated,” Analysts Say, August 6,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08/06/us-sanctions-on-iran-could-push-oil-prices-above-90-a-barrel-by-year.html>, 访问日期: 2019年3月14日。

特对也门、叙利亚和卡塔尔等国事务的涉入，都有与伊朗展开的地缘竞争有关。^①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沙特面临沉重的安全开支。尽管国防开支同比有所下降，但沙特 2019 年的国防预算高达 510 亿美元，占据预算总额的 17.3%。^②

因而，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使得沙特在承受巨大的财政开支压力同时，国家收入却增长乏力，直接影响了国家在改革领域的投入，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紧张同样不利于地区合作的进行。

（二）内部：标准极高的福利补贴体系和高层政治分歧成为沙特落实改革措施的障碍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沙特便利用丰厚的石油收入，在国内建立了完善的福利补贴体系。但在国家尚未经历现代化洗礼的情况下，便建立了标准极高的福利体系，这对沙特长远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一，社会福利开支具有刚性，一旦出现就难以削减，且有递增现象，庞大的财政开支成为沙特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沙特政府 2019 年的预算中，教育和培训、医疗卫生和社会的支出共计 973.2 亿美元，两项合计占沙特总预算支出的 33%。^③沙特的国民经济运转已经对高额福利产生了“路径依赖”，沙特王储曾明确表示，削减福利是临时行为^④；第二，长期超出正常水平的福利开支，削减了国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多数沙特公民就业集中在低效、没有直接产出的公共部门，大约 70% 的沙特公民受雇于沙特政府，^⑤尽管沙特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但私营部门始终增长乏力，沙特员工

① 相关报道参见：张帆：《“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载《当代世界》，2014 年第 10 期，第 61—64 页；龚正：《中东“断交风暴”影响几何》，载《世界知识》，2017 年第 13 期，第 44—45 页；马晓霖：《断交风暴：沙特聚众群殴卡塔尔的台前幕后》，载《华夏时报》，2017 年 6 月 12 日第 006 版；刘中民：《沙特与也门关系很复杂》，载《世界知识》，2015 年第 9 期，第 42—44 页；汤瑞芝：《沙特阿拉伯介入叙利亚危机政策探析》，载《国际研究参考》，2016 年第 4 期，第 31—36 页。

② Tareq Khaled, “Riyadh’s 2019 budget allocates \$51 billion for military,” December 19, 2018, <https://www.aa.com.tr/en/economy/riyadh-s-2019-budget-allocates-51-billion-for-military/1343149>, 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③ 数字来源：《沙特公布 2019 年财政预算》，2018 年 12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812/20181202818218.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④ Zahraa Alkhalisi, “Saudi Arabia pushes through pain of breaking oil habit,” May 3, 2017, <http://money.cnn.com/2017/05/03/news/economy/saudi-arabia-2030-vision-progress-pain/index.htm>，访问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⑤ Lvana Kottasová, “Saudi Arabia Reverses Pay Cuts for State Workers,” April 24, 2017, <http://money.cnn.com/2017/04/24/news/economy/saudi-arabia-wage-cuts-reversed/?iid=EL>，访问日期：2017 年 11 月 25 日。

的劳动素质更被雇主广泛诟病。^①

沙特此次改革与萨勒曼王储政治命运紧密相联。《沙特 2030 愿景》出台之初由小萨勒曼王子负责,是为其掌权诸多措施的一部分,2017 年 6 月 21 日,沙特国王萨勒曼颁布敕令,免去侄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王储的职务,任命其子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王储。萨勒曼国王废黜的纳伊夫王子没有失职,且任命其子继位的措施,打破了王室的继承传统,引发了沙特王室内部最有权势的苏德里系的分裂。^②沙特高层的政治斗争开始明显加剧。2017 年 11 月 4 日,沙特宣布成立由萨勒曼领导的反腐委员会。沙特政府以反腐的名义逮捕了大量王室成员与政府高官,尽管沙特政府一再强调这是政府反腐的需要,但爆出的种种消息使得整个事件充满权力斗争色彩。^③

2018 年 10 月,沙特记者贾马尔·哈苏吉 (Jamal Khashoggi) 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内被杀,更被认为是沙特王室内部矛盾激化的一部分,甚至已经出现部分沙特王室成员试图在沙特国王萨勒曼去世后撤换王储的传言。^④ 尽管哈苏吉一事对萨勒曼王储的负面影响似乎已经淡化,但由萨勒曼王储主导的多项政策如针对也门胡塞组织的军事行动、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以及与卡塔尔的“断交风云”,都没有为沙特带来明显的战略收益。尤其是针对也门胡塞组织的军事行动,从 2015 年至今,不仅没有结束,相反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沙特已经陷入也门持久战的泥潭。^⑤ 一旦萨勒曼王储本人政治地位动摇,沙特政府推动《沙特 2030 愿景》的力度无疑会受到削弱。

① Andrew Torchia, "Saudi Economy Accelerates in Secondquarter But Private Sector Still Sluggish," September 30, 2018,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s-saudi-gdp/saudi-economy-accelerates-in-second-quarter-but-private-sector-still-sluggish-idUKKCN1MA0M1>; Ambrose Carey, "800,000 Expats have Left Saudi Arabia, Creating a Hiring Crisis: 'Employers Say Young Saudi Men and Women are Lazy and are not Interested in Working'," July 9,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fr/us/saudi-arabia-foreign-capital-flight-expat-exodus-and-business-unrest-2018-7>, 访问日期: 2019 年 3 月 14 日。

② 丁隆:《接连换王储后,沙特迎来“萨勒曼王朝”》,载《世界知识》,2017 年第 14 期,第 43—45 页。

③ Danielle Pletka, "What Jus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The Weekend Purge Explained," November 8, 2017, <http://www.newsweek.com/what-just-happened-saudi-arabia-weekend-purge-explained-705617>, 访问日期: 2019 年 3 月 15 日。

④ Nick Tattersall, "Exclusive: After Khashoggi Murder, Some Saudi Royals Turn against King's Favourite Son," November 20, 2018,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saudi-khashoggi-royals-exclusive/after-khashoggi-murder-some-saudi-royals-turn-against-kings-favourite-son-idUKKCN1NO2KF>, 访问日期: 2019 年 3 月 14 日。

⑤ Jeremy M. Sharp, "Yemen: Civil War and Regional Intervent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24, 2018, p.9.

三、沙特尚未完成政治现代化

除世界石油市场变化外，沙特的改革之所以会面临来自内外的巨大阻力，与沙特政治尚未完成现代化密切相关。从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三个角度衡量，沙特并不符合福山有关政治现代化的定义。

（一）国家建设“人治化”

现代国家“按专门技术和技能合理地分工，使用非人格化的用人制度，对公民行使非人格化的权威”^①。但在沙特，部落传统与宗教和石油财富一同成为主导局势的关键因素。^②因此，沙特整个国家的运转与现代化相距甚远。

沙特国王只是各个权力集团的“共主”，国王的职权依赖各方认可。因而，沙特整个国家的建构和运行充满了“人治”色彩。首先，国家成为部落和家族联盟。沙特王国的建立即是依靠伊本·沙特的军事征服，但同样依赖与不同部落之间的联姻。伊本·沙特曾与30多个部落联姻，沙特家族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国内重要的部族建立起广泛的血缘联系，从而成为政治联盟。^③沙特、谢赫、朱贝儿、希斯里、苏莱曼和拉登等六大家族，更是垄断了沙特政府、宗教、军队和商界的优质资源。^④其次，宗教成为国家权威的重要来源。沙特人对瓦哈比教派的信仰，成为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宗教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使得在沙特宗教从来就不是私人事务，沙特的内外政策始终难以摆脱宗教因素的干扰。

（二）法治权威的弱化

“法治”被理解为这样一组规则，即对社会中最强大政治参与者也具有约束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7页。

② Joshua Teitelbaum, Harry St. John Bridger Philby, William L. Ochsenwald, “Saudi Arabia,” March 9, 2019,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audi-Arabia>,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5日。

③ 吴彦：《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演变特征》，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2期，第56—57页。

④ 参见《揭秘沙特阿拉伯的六大家族》，2015年1月23日，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j/201501/t20150123_6427812.htm，访问日期：2019年3月15日。

力。^①沙特的法治设计却使沙特成为特权社会。沙特拥有世俗与宗教两大法律体系。在世俗法律领域,虽然名义上沙特坚持三权分立,且有《政府基本法》保证,但规定“国王是三权的最后裁决人”。^②人事制度的安排更确保沙特统治阶层拥有对宗教法律的解释权。现代沙特就是在沙特家族和谢赫家族联合基础上建立,两大家族分别代表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谢赫家族成员垄断了沙特的一个重要宗教职位,尤其是大穆夫提,该职位拥有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权。此外,沙特国王还享有伊斯兰教教长(伊玛目)的称号。^③这也就意味着沙特国王同样享有宗教权威。

沙特的法治体系难以对统治阶层施加有效约束,直接导致沙特法律实践的随意化,如对有关沙特王位传承《基本政治制度》的修订完全跟随现实政治需要进行。^④国家法治体系缺乏必要的权威性,直接导致“国家法律被忽视,因为没有人将它们视为是合法的”。^⑤

(三) 负责制的缺位

对待负责制,福山在其著作中区分了“程序性负责”和“实质性负责”,将前者定义为“自由和公平的周期性多党选举,让公民来选择和约束统治者”^⑥,将后者理解为统治者自我对公共利益关心,并且肯定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更指出“良好的程序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实质性效果”。^⑦即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外衣,也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是不负责的。但“‘负责制’一词,主要是指现代的民主国家依靠程序保证政府回应公民的需求”^⑧。政府与民众必须拥有机制化的互动渠道,政府和反对派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这样的体制下,“向广大公众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② 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③ 唐宝才:《略论沙特阿拉伯政治制度及政治民主化走势》,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3期,第59页。

④ 丁隆:《接连换储后,沙特迎来“萨勒曼王朝”》,载《世界知识》,2017年14期,第45页。

⑤ [美] 赛斯·D·卡普兰著:《修复脆弱的国家:发展的新范例》,颜琳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⑥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

负责的原则和反对派的合法性都获得正式承认”，并通过“建设性反对”的方式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变为国家政策，以防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博弈让国家机器瘫痪。

但沙特的政治制度在设计上具有压制性。沙特禁止政党活动，整个国家长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选举。直到2005年2月10日，在面对内外压力的情况下，沙特才在利雅得省举行了建国后首次地方选举，即市政委员会选举。沙特市政委员会是其国内唯一有民选官员的地方，职权范围极为有限，仅限于地方事务，包括负责街道、公共花园和清理垃圾等。^①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组织和制度化的渠道，进行彼此诉求的良性互动，导致沙特的反对派和政府几乎是“天然对立”。这种情况下，宗教和清真寺为沙特反对派提供了意识形态和活动场所，公民的社会诉求往往演变为逊尼派与什叶派、温和宗教信徒与极端分子之间的宗教分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成本。

正是沙特在政治制度领域建设上的不足，造成了国家权威来源的多元化与权力结构的碎片化，引起沙政治特制度的“衰败”和国家能力的衰退，从根本上造成沙特长期无法摆脱“资源诅咒”。

四、政治建设落后导致沙特深陷“资源诅咒”

（一）国家权威多元化与沙特内外政策僵化

尽管瓦哈比教派构成沙特国家权威的重要来源，但在主权国家体系下，沙特同时具有民族国家的“外壳”，国家权威来源的“非独一性”导致沙特国家权威经常受到来自民族主义和各种政治伊斯兰思想的挑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沙特为防止埃及贾迈勒·纳赛尔倡导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对其政治体制的威胁，不惜与埃及展开地缘争夺。1957年，沙特向约旦国王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帮助约旦国王解散亲埃政府。1958年为阻止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沙特秘密贿赂叙利亚高级军官。1962年至1970年的也门内战也成为了埃及和沙特对抗的舞台。^②

^① “Saudi Arabia Elects its First Female Politicians,” December 14, 2015,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12/women-win-seats-landmark-saudi-arabia-elections-151213054750832.html>,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5日。

^② 林丹妮：《纳赛尔时代埃及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载《唐都学刊》，2006年第5期，第120页。

进入20世纪70年代,沙特的国家权威开始受到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冲击。1979年2月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政治伊斯兰力量深受鼓舞。1979年11月20日,沙特麦加大清真寺发生严重暴乱,沙特与伊朗自此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同期,穆兄会在中东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更在逊尼派内部对沙特构成挑战,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系。^①沙特与埃及、伊朗和卡塔尔的地缘竞争既有地区权势争夺的考虑,也有捍卫国内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要。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妥协性,这无疑加大了沙特地缘战略调整的难度。

国家权威来源的多元化,在沙特内部对国家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由于沙特政府在国内大力扶持瓦哈比教派,强化了什叶派少数民众与逊尼派民众之间的身份定位差异,对宗教的认同削弱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人为制造了国家整合的障碍。国家可能看起来很安全,但是内部很虚弱,无法适应变革,除非它们要么在其民众中培育更大的凝聚力,要么找到一种能够补偿分裂本性的结构设计或者策略。^②沙特政府只能依靠国家暴力机关强力弹压,并用发“红包”的方式来获得表面的稳定。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沙特政府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甚至会增加相关福利开支。从1982年起,沙特石油收入从高峰急转直下,沙特民众享受的政府津贴却几乎倍增。^③尽管面临国际油价低迷的打击,但2015年2月,为庆祝其登基,沙特国王萨勒曼向国民发放了总额高达320亿美元的“红包”。^④

恶劣的政治环境对沙特发展转型十分不利,不仅分散了国家的精力,更导致大量的资源流向为国防与社保等不具有生产性的领域。

(二) 国家权力结构碎片化限制沙特政府的施政空间

作为国内各派势力的“共主”,为维持自己地位,沙特国王与国内的大家族、大部落之间建立了庇护关系。庇护关系是指一种角色之间的交换,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涉及双边的工具性友谊关系的特殊情况,其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

① Alexey Khlebnikov, “The New Ideological Threat to the GCC: Implications for the Qatari-Saudi Rivalry,”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7, No.04, 2015, pp.117-28.

② [美]赛斯·D·卡普兰:《修复脆弱的国家——发展的新范例》,颜琳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③ 梅新育:《展望2016年油价、沙特财政及其国际影响》,载《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37页。

④ 相关报道参见:《沙特新国王庆祝登基 向民众发320亿美元“红包”》,2015年2月26日,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2-26/7081115.shtml>,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5日。

(庇护者)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个人服务)作为回报。^①在这种关系模式中,沙特国王成为石油收益分配中心,向各个权力集团分配收益,换取效忠,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绝对权威。

权力集团进而转化为食利的特权利益集团。经济史学家奥尔森认为,特权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社会效率与总产出下降。^②石油收益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因此当国际油价下跌对国家形成改革压力时,特权利益集团出于稳定自身收益的需要反而会阻挠任何可能影响石油收益分配额度的改革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沙特权利益集团中的反对改革势力往往借助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乌里玛,将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进行宗教包装,导致宗教往往成为沙特各方阻挠改革的借口。

正是因为政治制度的“孱弱”,沙特政府不仅无力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反而产生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五、总 结

“资源诅咒”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流发展方案,难以从根本上根治“资源诅咒”。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种改革方案大都集中在经济领域,对有关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容涉及较少,甚至对政治制度具有破坏性作用。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过于强调市场作用,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平竞争环境,对于自然资源的控制往往落入少数寡头手中,国家经济成为“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社会的失序和国家的混乱。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国家主义过于强调国家的能力和干涉,但缺乏相应的政治改革内容,结果只能是大量的政府腐败行为和无效的国有企业。只有在国家、法治与负责制达成平衡,实现政治现代化,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① James C.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6, No.1, 1972, pp.91-113.

^② 林海虹、田文林:《伊朗经济困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2期,第15页。

伊朗与沙特同为产油国，但伊朗不仅拥有庞大和多样化的工业基础，同时，尽管面临美国的长期制裁，伊朗的信息产业发展却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①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朗解决了政治现代化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虽然依照西方标准，伊朗“退向”了政教合一体制，但伊朗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调和了宗教和世俗主义的矛盾。伊朗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定期的“双轨”选举机制，既宗教系统和政府系统的双轨选举，选举的广泛性和真实性，保证了社会各主要利益集团都可以充分发声，整个体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包括最高领袖和总统在内的主要宗教和政府领导人，不仅要通过选举产生，还要接受议会、宪法监督委员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督，这些机构又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在伊朗的政治框架内，宗教和世俗社会、权力机构和社会都可以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互动。因而，伊朗无论在经济活力、抗压能力还是经济部门的活力上，都远胜于沙特。

一旦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伊朗无疑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从2015年7月至2018年5月，伊核协议的达成至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由于制裁的取消与外部安全环境改善，三年间伊朗经济发展可圈可点。^② 这充分证明了伊朗的制度建设是拥有发展潜力的，而伊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现代政治的制度形式与自身社会现实相结合方式，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责任编辑：张颖）

① Judith Evans, “Fund Managers on the Iranian Frontier,” February 28, 2015, <https://www.ft.com/content/7de6a358-b798-11e4-8807-00144feab7de#axzz47HQajJna>; “Iran’s Tech Startups Are Doing Great Despite Sanctions,” October 6, 2017, <https://nypost.com/2017/10/06/irans-tech-startups-are-doing-great-despite-sanctions/>,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5日。

② Kimberly Amadeo, “Iran’s Economy, the Impact of the Nuclear Deal and Sanctions,” February 27, 2019, <https://www.thebalance.com/iran-s-economy-impact-of-nuclear-deal-and-sanctions-3306349>, 访问日期：2019年3月15日。

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s, this paper discusses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se risks in hope of supporting the cross-border M&A practice of Chinese acquirers.

【 Key Words 】 intellectual property, overseas M&A,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Authors 】 Cong Lixian,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research a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Qi Haixia, Ph.D. candidate of Law School,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Analysis of the “Resource Curse” of Saudi Arabia (108)

Zhang Shuai Chu Bin

【 Abstract 】 Ever since the “Arab Spring”, Saudi Arabia’s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has rapidly been increasing, so its own development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externality”. However, as an emerging market country, Saudi Arabia suffers from a typical “resource curse”. Whether Saudi Arabia can overcome the “curse” is of significance to both the stabilit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The latest attempt by the Saudi government to overcome the “resource curse” is the “Saudi 2030 vision”, which was launched in 2016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In spite of the measures, the low level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s caused great damage to Saudi Arabia’s governance capacity, which will hamp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vision of Saudi Arabia. If Saudi Arabia does not carry out structural reforms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the whole country will still be trapped in the “resource curse”, which will not only produce uncertain factors for Saudi stability, but even threaten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 Key Words 】 Saudi Arabia, resource curs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 Authors 】 Zhang Shuai, Ph.D. student in Applied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y; Chu Bin, Ph.D. student, Taiw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Taiwan Question.

Analysis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India (123)

Huang Zhong Tang Xiaosong

【 Abstract 】 The public diplomacy toward India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ndia. It exerts a unique influence in shap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trust, fostering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mutual benefits and eliminating cultural cognition barrier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with India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which the biggest driving forces are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national leaders' personal demonstration. The Embassy of China to India plays an overarching part in overseas activities, with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as the main brand. In term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is still weak.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no-India relations in both the Western world and India. The strategic anxiety about China among the Indian public is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 In this regard, China must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with India, and continue to vigorously develop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Embracing the world's development trend, China should make efforts to counteract the view of negative competition, actively cultivate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shared future, accurately position the security issues, do a good job in crisi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ocial elite and the media at critical moments.

【 Key Words 】 China, India, public diplomacy